

社會主義國家的空間政治

——中國城市公共生活的萎縮和擴張

王 笛

[提 要] 從1949年至2000年間中國城市公共生活的變化，展示了社會主義時期的空間政治和國家與大眾娛樂活動的關係。社會主義初期，國家權力深入到日常生活的各個層面，城市公共生活也日趨萎縮，這是與整個中國政治大環境分不開的。改革開放後，隨著經濟的發展，各種社會群體、團體、公益組織等興起，隨之而來的便是公共領域的擴張。隨著現代化、商業化、全球化以及各種公共空間的興起，像茶館這樣的傳統公共空間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

[關鍵詞] 空間政治 公共生活 茶館 中國城市 公共領域

[中圖分類號] K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8) 04 - 0186 - 13

1949 年以後，國家政策和社會制度對中國城市的發展和城市生活產生了深刻影響，雖然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中國城市和城市政治、文化與國民黨時期有了巨大的不同，但是共產黨的城市管理和治理並不是憑空建立的。關於社會主義時期公共生活的研究，揭示了一系列新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在社會主義初期，國家的文化政策是完全嶄新的，還是對前朝有所繼承？國家權力是怎樣在日常生活的層面，為社會主義的娛樂的建立打下了基礎？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發展，怎樣造成了公共生活的復興？由於社會發展，文化生活更加豐富，國家統一的文化也進一步擴張，地方文化面臨著怎樣的挑戰？經濟的發展，中產階級的擴大，各種社會群體、團體、公益組織等興起，在社會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隨之而來的便是公共領域的擴張，但是怎樣認識這種公共領域？隨著現代化、商業化、全球化以及各種公共空間的興起，像茶館這樣的傳統公共空間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怎樣面對這樣的挑戰，關係著這個傳統社會的最基層的單位，是否能夠再次順應時代而生存並繼續發展。這些問題，都是城市史的研究者所需要回答的。

我們還可以看到，社會主義時期的公共空間在毛澤東時代逐漸地縮小，但在改革開放時代又重新擴張，公共生活得到了極大的豐富和發展。因此，城市公共空間的萎縮與擴張，是與整個中國政治大環境分不開的。本文將討論 1949 年至 2000 年間中國城市公共生活的變化，特別是討論以下問題：繼承還是斷裂、社會主義時期的空間政治、國家與大眾娛樂活動、改革開放後的文化

挑戰、城市的記憶與城市文化遺產、以及公共生活的現代性。我們將看到，社會主義時期的中國城市公共生活，經歷了從萎縮到擴張這樣一個過程。

繼承還是斷裂？

中國在 1949 年以後經歷了許多社會與文化轉型，我們已經看到不少關於中國社會變化的研究，特別是對沿海地區，但歷史學家相對來說較少地去考察社會與文化的延續性。過去關於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把民國和人民共和國視為截然分離的兩個時代，當然這沒有錯，因為無論在政治體制、統治方法、經濟文化政策等等方面，這兩個政權的確有非常明顯的不同。但是最近關於人民共和國歷史的研究，學者們看到許多關於民國與人民共和國間的聯繫，在某些方面這兩個政權存在著政治、經濟、政策的持續性，發現共產黨的政策，並非是我們過去所理解的與國民黨時代截然分離的。例如葉文心（Wen-hsin Yeh）在研究民國時期上海中國銀行的空間、時間和日常生活時，發現“近代都市資本主義工商企業的產物跟社會主義之下孕育的若干制度並不是全然背道而馳的，兩者之間在威權結構及大家長式管理哲學上頗有相通之處，與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的對立無關。”^①

2013 年，哈佛燕京學社組織了一個“再思 1949 年分水嶺：政治學與歷史學的對話”（Rethinking the 1949 Division: Dialogue between Political Science and History）工作坊，參加者包括中、美兩國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的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如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柯偉林（William Kirby）、柯麗薩（Elisabeth Koll）、楊奎松、張濟順、李里峰等，我也參加了這個工作坊。這次工作坊涉及的問題包括國家經濟政策、鐵路交通、社會主義娛樂的興起、對一貫道的打擊、1954 年憲法草案、1911 和 1949 革命的比較、美國大學在上海、社會福利制度以及群眾運動等。參與工作坊的學者幾乎都同意（雖然在不同程度上），國共兩黨在許多方面都有著連帶關係，在不少觀念、習慣、經濟政策方面，兩黨並沒有不可跨越的鴻溝。^②這項研究同時關注了公共生活的改變與延續以及兩者的互動。我在《茶館》第二卷裡用具體的證據去判斷，在中國的一個內陸城市中，其公共空間、公共生活、大眾文化，哪些發生了改變，哪些仍保持了原狀，或者變化非常之小。^③

中共通過革命運動取得政權，又以革命的模式建立了“革命文化”“新文化”和“社會主義娛樂”，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革命宣傳，注入到社會生活之中。政治思想教育，以馬列主義思想為指導，推崇英雄主義、愛國主義、革命精神，這些對黨的事業都至關重要。黨與國家在短期內就控制了社會的方方面面，包括言論和日常生活。在 20 世紀 50 年代，許多人都積極、熱情、樂觀，對未來滿懷信心，希望為國家繁榮富強添磚加瓦。在這種環境下，被執政者認為是舊的、落後的傳統與文化的生存，面臨著極大的困難。

毫無疑問，共產革命給中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震動，但我們不能認為社會主義中國的一切都是全新的東西，過去的一切都被拋棄了。如果我們仔細考察，就會發現，舊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仍然發揮著影響。文化和社會習俗都不可能輕易地或是完全地被摒棄。雖然一方面，社會在發生劇烈的變化；但是另一方面，許多傳統依然貫穿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這充分顯示了文化的持久性。與此同時，一波又一波的思想改造和政治運動，試圖重塑日常文化和生活方式，因而削弱了公共生活和公共空間，擠壓了傳統文化。因此，可以說在 20 世紀後半葉的中國，文化的連續和斷裂並存。

基於政治目的而塑造的“新文化”，對公共空間和公共生活的影響是巨大的。新政權通過確立社會主義的娛樂，來改變傳統表演節目的“不良影響”，同時使其成為引導人們走向“正確方向”的有效工具。當然，共產黨不是第一個持有這種想法的執政者。自晚清以降，大眾娛樂就被不斷現代化的國家機器和正統精英批評為低級趣味，必須受到限制和改造。精英們常用“下流”“醜陋”“淫穢”等詞語來批評大眾文化，成為建立正統文化霸權之一部分。共產革命勝利後，在建立強有力的文化控制模式上走得更遠。例如，在文娛演出中，任何有關於調情、性愛、敬神、拜神之語言和動作，都會被認為是“有害的娛樂”，因此對民間表演的唱詞、評書、地方戲等進行改造，便是順理成章了。從晚清、民國到早期社會主義時期，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但國家機器對大眾文化的消極態度卻是始終如一的。

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就對茶館的消極態度而言，實際上國共兩黨的政策十分類似，並沒有什麼本質的不同，它們都把其視為一種對社會有害、滋生懶惰和各種惡習之場所，因此必須進行改造。不過，國民黨政府沒能把權力延伸到社會的最底層。但1949年後，公共空間和公共生活基本上被國家機器所控制。比較民國時期與1950年之後的茶館，我們會發現已經有了許多的不同。首先，從私有制到集體所有制（甚至是國家所有）的轉變，導致了城市經濟結構的巨大變化，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包括做生意、娛樂、社交等活動，都被改變了。再者，政府的政策對茶館的管理與經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例如茶館的註冊、雇工、稅收、經營都被政府所干預。其三，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如“三反五反”、社會主義改造、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對茶館的生存造成了極大的威脅。最後，茶館娛樂的結構和形式，都受到了政府的監管。這種政策對茶館和休閒所造成的結果，在之前的城市生活中是前所未有的。

1950年之後，小商業的蕭條，導致了公共空間和公共生活的衰落，這也是政府強化控制的不可避免的結果。不過，即使是再強大的國家機器，也不能在短時期內完全控制小商業、公共空間以及整個城市的日常生活。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傳統的經濟和生活方式在20世紀50年代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但是在新的政治控制下逐漸走向沒落。雖然茶館的公共生活仍然名義上還在進行，但卻越來越受到來自政權的干擾。當人們都必須做出“進步”和“積極”的姿態時，加之國家消除坐茶館等“不良”習慣的努力，茶館業所遭受的壓力是可想而知的。茶館的顧客直線下降，除了那老年老的、對坐茶館有著根深蒂固感情的顧客，茶館裡已很難覓見年輕人的蹤影。

茶館作為中國傳統文化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有著悠久的歷史，並在各種政治、經濟和社會的變遷中倖存下來。在1950年至1976年間，茶館和公共生活從繁榮到衰落，但從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使得茶館和公共生活又從衰落走向繁榮，因此在2000年之前的這50年間，茶館和公共生活經歷了兩個相反方向的演變過程。在第一個階段，激進的政治運動和階級鬥爭，使人們被迫退出公共空間；但隨著改革開放時代的到來，人們又得以重返公共生活。雖然共產黨在建政後，採取了與國民黨非常不同的文化政策，但實際上，我們卻依然能夠看到國共兩黨在政策上類似的影子，因為兩黨實際上都無法完全脫離傳統的價值觀，正是這種價值觀，產生了國家控制公共空間的政治文化。大眾文化有著強有力的生命力和延續性。在“文化大革命”中，大眾文化沒有因窒息而死亡；在改革開放以後，也沒有因空前的現代化、商業化、全球化的衝擊而消失。

同時，毛澤東時代（早期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時代（後期社會主義）也並不是截然分離的，而是作為一個政治體系的兩個方面，這兩個時代體現了社會主義國家政策的延續性，並影響到現今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周傑榮（Jeremy Brown）和畢克偉（Paul Pickowicz）在他們對20世紀

50年代中國的研究中指出，在改革開放後，也有人開始讚頌1950年代，提供了關於那個時代的美好記憶：

後毛澤東改革時代的出版物對20世紀50年代早期有著積極的記憶，認為這兩個時期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但並不是只是巧合。在這些記憶裡，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10月成立之後——20世紀70年代毛澤東逝世之後——出現農民進城大潮，私營工廠與國營大公司和諧共存，教會和非政府的組織在共產黨領導下運作，資本家和其他無黨派人員支持共產黨政權並參與國家政策制定的局面。^④

儘管有這些相似之處，但我要指出的是，20世紀50年代和改革開放時代是朝兩個不同的方向發展的。前者是從很少國家干預的自由市場經濟，轉向國家控制加強的計劃經濟的一個時期。儘管20世紀50年代農民還能進城務工，但國家已經開始強制把一些城市居民送到農村，後來又設立了戶口登記制度，來防止農民遷入城市。改革開放時代的發展方向與20世紀50年代是相反的，即從國家緊密控制的計劃經濟，逐漸轉向減少了國家干預的市場經濟，同時放寬人口流動限制，鼓勵農民進城務工。

社會主義時期的空間政治

在社會主義初期，國家對社會進行了嚴密的控制，在中國歷史上，還沒有其他政權能像社會主義國家那樣，掌握了幾乎所有的資源，控制了城市公共生活的場所以及休閒活動的各種形式與內容。例如，當共產黨進入城市後，雖然百廢俱興，但新政權立即採取行動，開始對日常生活與大眾娛樂進行改造。在晚清至民國期間，大眾文化一直抵制精英和國家的控制。在1949年以後，我們仍然可以看到這種抵制，但是當與最強大的國家機器進行對抗時，這種抵制的結果是十分有限的，許多娛樂與大眾文化的傳統形式逐漸消失了，因為它們不被“革命文化”與社會主義宣傳所認同。

不過，我們應該認識到，雖然毛澤東時代在政策上對茶館以及其他公共空間進行嚴格限制，但是公共空間、日常生活和大眾文化卻有著頑強的張力，它們不斷地與國家機器較量，並利用國家不可能控制一切的空隙，喘息生存，而它們一旦有了機會，便會復甦發展。雖然國家權力和社會之間的衝突日益加劇，但是現實要複雜得多，它們並不總是對立的兩端，到處都存在灰色的地帶。另外，國家的政策也不總是一成不變的，隨著政治運動的起落，國家對公共空間和日常生活的控制也時松時緊。

改革開放是公共生活的一個轉折點，因為國家把重心轉移到了經濟發展，弱化了對人們的控制，減少了對日常生活的介入。因此，在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同時，公共生活也逐漸復甦並變得越來越自由。雖然仍在社會主義政治體制下，但日常生活更多的是被開放的市場和經濟改革所支配。從很大程度上來說，公共生活逐漸脫離了我們過去熟知的社會主義的軌道。而復甦後的公共生活與之前也有了很大的區別，新興的商業文化對茶館和茶館生活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作為本土文化的代表，茶館在面臨全球化的進程中，也需要去尋找一條適應自身發展的道路。

我關於20世紀茶館的第二本書，便聚焦在社會主義時期成都茶館的微觀歷史，觀察這個城市公共生活的進程，探索其中的故事以及變化的程度。書中所關注的時期從人民解放軍接管成都開始，並經歷早期社會主義疾風暴雨般的政治運動，這些運動影響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使得城市裡的公共生活逐步走向衰落。這個研究的後半部分，關注的是毛澤東之後的改革開放時代，或社

會主義後期階段，在這個時期，城市的公共生活出現了令人振奮的復興。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茶館生活是成都公共生活的一部分，但並不是全部，與這個國家的其他組成部分一樣，也在不斷地變化之中。在這個研究中，我們將會看到茶館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為什麼這種傳統的、最基層的文化單位，在飛速發展的現代化過程中，在面臨其他各種公共空間挑戰的情況下，仍然煥發著活力，甚至日趨興旺發達。此外，以茶館生活作為著眼點，觀察政治和社會的變化，我們將看到改革開放給公共生活的復興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機會，創造並促進了公共領域的發展。J. 加德納（John Gardner）在其 20 世紀 50 年代早期“五反”運動的研究中指出，“對這個政權來說，那時中國的資本家似乎並不是真正的問題，儘管沒有關於他們態度的實際分析，但資本家們似乎（對）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框架裡的運作頗為滿意。”^⑤但是，他們和新政權合作的夢想很快就破裂了。然而，他們沒有想到的是，包括早期研究那個時代的學者們也沒有能預測到，中國在後毛澤東時代會轉向市場經濟，並真正地與資本家進行全面合作。

在後毛澤東時代，中共面臨著怎樣運用政治的力量，把市場經濟植根於社會主義體制之中的問題。改革開放後的中國，雖然仍然保持社會主義制度，但在經濟上實際已經是一個複雜的體制。我們看到私營企業的發展，以及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按照正統的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已經很難解釋中國經濟體制的性質。所以西方的一些學者，不再使用“社會主義”這個詞，而更多地用“晚期社會主義”（late socialism）或“後社會主義”（post-socialism）來表述現代的中國。^⑥改革開放以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隨著時代的發展，不再像過去那麼重要。一方面，黨和政府密切關注著一些重要的部門，如媒體、教育、出版物等等；另一方面，他們也放鬆了對一些領域，如小商業、大眾娛樂和商業文化的直接控制，留給了茶館更多的空間以供人們進行公共生活與社會活動。

我《茶館》的第二卷通過考察 20 世紀下半葉的成都茶館，試圖去回答如下問題：國家權力怎樣介入到小商業的經營之中？社會主義娛樂是怎樣在地方社會中被建立起來？傳統行會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並最後怎樣走向衰亡？政治運動怎樣改變了茶館和公共生活？在改革開放時期，茶館是如何走向復興的？公共生活是怎樣影響城市形象的？國家和人民又是如何看待這一問題的？等等。通過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可以加深對國家機器控制下的成都公共生活和政治文化的理解，並從對成都的歷史考察，折射出其他中國城市的一些共同經歷。

國家與大眾娛樂活動

在 1949 年以後，國家為了有效地控制大眾娛樂，對各地各級的大眾娛樂和表演藝人們進行了全面地調查，為其管理和控制政策的實施奠定了基礎。從晚清到民國，地方政府進行過多次類似的調查，但從來沒有如此詳細和全面，這反映出新政府對社會娛樂控制的強烈動機與能力。當然，這些調查也為今天我們研究國家對大眾文化的控制，提供了珍貴的資料。調查具體內容，有助於政府瞭解每個演出團體的歷史、現狀、階級成份、工資、政治背景，以及表演的節目的形式和內容，還有經營、管理、會計、培訓和表演場所的狀況。調查的動機很明顯，即限制、改造和加強管理。因此，他們關注的是行業控制問題，而非這些民間藝人能否為觀眾帶來真正的娛樂。所以，這與我們以往所瞭解的傳統休閒之目的是背道而馳的。

我關於社會主義時期茶館的研究發現，黨和國家的控制滲入到小商業內部和演出班子之中，改變了它們的管理、人事、組織結構等，並幫助它們建立現代會計制度，把戲班子從迎合大眾口

味的、鬆散的家庭管理的模式，轉變為接受社會主義道德和政治意識形態、服務教育大眾的團體。從 20 世紀 50 年代初，社會主義的宣傳便被注入到各種娛樂形式之中，緊跟政治運動的步伐，配合諸如土地改革、“三反五反”、集體化、大躍進以及“文化大革命”等運動。因此，茶館中的民間藝人和表演，都成為國家政治的宣傳工具，政府利用公共場所來進行政治宣傳，傳播社會主義的政治文化。

在這個時期，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政治文化主導了社會的方方面面，茶館這樣的休閒空間成為政治和階級鬥爭的場所，業主、僱員和顧客主動或被動地被捲入其中。茶館作為傳統公共生活和休閒之地，很難被社會主義敘事和革命話語所容納，因為其是與經濟發展和推進工業化的需求所不相符的。因此，茶館不得不為城市工業化的大目標讓路。大多數的茶館業主和表演者們都在艱難的環境中求生存，但在接踵而來的政治運動中，茶館仍不斷地被削弱乃至被摧毀。

我關於社會主義時期自發娛樂的研究，討論了政府消弭這個活動的努力，特別是對打圍鼓的圍剿。不少人以這個活動作為職業並賴以為生，為了讓這些人有個活路，地方政府不得不進行妥協，沒有採取立即禁止的政策，只是逐步予以取消，暫時默認它們存在。不過，政府也對其進行了嚴密的監管，以保證其“內容健康”。其實打圍鼓的起伏，是傳統娛樂對國家控制進行抵制的一個極好的例子。打圍鼓是一種自發的娛樂，是民眾參與的一種活動，政府在 20 世紀 50 年代大力整頓後，其作為一個謀生方式逐漸消失了。根據檔案資料的記載，我們知道政府解決此問題的辦法，是將他們驅逐回農村，但是他們為了生存，又回到了城市，並繼續以此為生，因此政府無法完全禁絕，這可以視為是人類學家 J. 斯格特（James Scott）所說的，人們以“弱者的武器”作為日常反抗的一種形式。^⑦

政府迫使外來的民間藝人回到他們農村的家鄉去，反映出政府對城市生活所持有的一種消極態度，即認為城市生活會滋生惡習。^⑧實際上，從 20 世紀 50 年代開始，政府便制定了鼓勵城市居民到農村去的“上山下鄉”政策，這個政策在“文革”時期達到頂峰，即青年人都必須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周傑榮在其毛澤東時代中國城鄉關係的研究中，以天津作為例子，討論政府把農村人口與城市居民分離開來，以達到“淨化城市”的目的。^⑨之所以要把那些沒有“正當職業”的人遣送回鄉，是為了促進城市社會的穩定，這正是社會主義城市改革的重要部分。政府對民間自發娛樂的消極態度，使人們不可能以打圍鼓為生；甚至只作為一種自發的娛樂方式，打圍鼓也是岌岌可危的。圍鼓的存在和消亡，後面都具有複雜的因素，國家對大眾娛樂實施了嚴密的控制，使許多人不僅失去了傳統的娛樂方式，還丟掉了謀生的手段，因此不得不尋求打圍鼓為生。市文化局拒絕承認這是一種合法的職業，並想盡辦法消除它。然而，基層官員對轄區內的居民負有更直接的責任，相對而言，他們更關心怎樣安置這些人的生活，而非更高層次的建立“革命的娛樂”和社會主義的宣傳。他們並未積極地參與對打圍鼓的圍剿，因此受到文化局的指責。^⑩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雖然國家的權力已經強大到可以深入到社會基層，但仍然無法在一夜之間達到其完全控制基層社會的目的。

應該指出的是，在取消圍鼓演唱的過程中，許多婦女不得不因此回到廚房中。在革命的話語中，婦女解放、走出家門是中共的一貫主張，而取消圍鼓時有婦女表示“願意回去做家庭婦女”，在政府的報告中其卻是以積極的口吻表達出來的。取消圍鼓，把她們又趕回家門，並成功地說服她們認識到，出來打圍鼓，是“打錯了主意”。這與黨的婦女解放和經濟獨立的一貫主張顯然是背道而馳的，但卻是政府現階段所竭力推行的政策。因此，對新政府來說，建立革命的娛樂問題

比婦女走出家門更為重要。^⑩我們應該意識到，在早期社會主義階段，雖然政府控制茶館，但其他公共空間、日常生活以及大眾文化仍然保持一定的能動性，儘管它們的存在會對黨和政府形成挑戰。可國家不可能控制一切，因此當文化和公共空間一旦獲得了機會，它們就會復興，打圍鼓活動便是最好的例子。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開放後的時代，社會主義國家也從未完全置身於社會和文化生活之外，它仍然力圖施加影響。張鵬（Li Zhang）在研究“後社會主義”轉型中的城市外來工時，提出人們認為市場經濟的發展是“國家的退出”和“市場與資本主義的勝利”，是一種錯誤的設想。^⑪王瑾（Jing Wang）也持有相似的概念，其在1989年之後，國家也積極參與到消費和經濟文化之中。她試圖去解釋，“在20世紀90年代，文化作為一種政治和經濟資本的積累形式，是怎樣被重新建構的。”她發現“後社會主義國家”運用了不同的策略去維持它的影響力，“國家不僅參與到了文化建設之中，也通過市場提高了其影響大眾文化的能力，特別是在話語層面。”因此，“國家重新發現，它能夠像運用新興的科技到經濟之中一樣，也同時可以把其作為治國策略之一，這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創立以來最富創造性的手段之一。”^⑫

但是我認為，國家在後毛澤東時代不過是找到了一種新的更微妙的方式去影響文化與娛樂。儘管新的消費文化無疑比之前更加多樣化，但地方文化的特質卻越來越弱，更多的是呈現出千篇一律的同一性，而非充滿生氣的豐富多彩，這反映了統一的國家文化的勝利。而這種國家文化可能被現代化、商業化以及政府行為所驅動。國家的現代化發展政策有利於統一文化的形成，但同時地方文化的生存則面臨挑戰，並不斷地被削弱。雖然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的參與已經減少很多，但這不過是管理國家的策略與方式的改變。政權的影響力仍然是十分巨大的。雖然人們有更多的自由去公共空間並享受公共生活，但是國家其實也積極參與到大眾文化的創造之中。

通過考察1949年以來的大眾娛樂，可以看出共產革命以及各種政治運動，是怎樣影響普通人民文化生活。在空前歷史劇變時期，從社會主義早期開始，到激進的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再到後毛澤東時代的改革開放，茶館一直是街坊交流與社會互動的中心，是社會各階層的人們施加影響和竭力佔領的公共空間。茶館作為一個微觀世界，為我們觀察社會、文化和政治轉型提供了一個理想的視角。這個研究也同時指出，雖然我們看到國家權力擴張與基層社會的矛盾，但是實際的情況卻複雜得多，它們並不總是二元對立，灰色的地帶無處不在。國家的政策也並不都是一成不變的，這些政策對於公共空間和日常生活的控制會隨著政治運動節奏的快慢而時松時緊。

此外，我還關注茶館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茶館一直都是街坊鄰居社交的中心，因此是一個觀察政治權力怎樣發揮作用的絕佳地點。作為一個微觀世界的茶館，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理想的視角，去觀察社會、文化和政治的轉型。因此，想要完全瞭解一個城市，需要我們深入它的最底層，去考察城市社會生活中最基本的單位。茶館就是最重要的公共空間之一，為社會經濟活動提供了一個極為方便的場所。在那裡，我們可以看到社會主義政治文化是怎樣被施加到公共空間之中的，並怎樣導致了公共生活的改變。隨著1949年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中國的日常生活經歷了一個根本的變革。儘管我們知道這場變革的重要性，但我們對具體的細節，尤其是關於城市社會底層的生活卻知之甚少。社會主義時期茶館的研究，為我們便提供了關於日常社會生活中最基本層面的深刻理解。

改革開放後的文化挑戰：國家與地方

國家怎樣對社會和日常生活進行控制，一直是 20 世紀中國的一個重要話題。在晚清，國家權力就試圖滲入到社會底層，到了民國時期更有所強化。當國民黨失敗、中共建政後，國家機器對社會的深入，表現得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為強勢。^④因此，在 20 世紀下半期，地方文化也被逐步被納入到國家文化之中。

“地方文化”是一種區域性的現象，與地方的地理環境、經濟、語言和生活方式有關，這些因素塑造了人們不同的生活方式。要對“國家文化”進行準確的定義很難，由於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和通訊工具的發展，以及強有力的大一統的現代國家政權，大幅度擴展了地區之間的交流，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地方文化的演變。因此，“地方文化”和“國家文化”的概念不是一成不變的，且經常重疊。我認為國家文化至少應該包括以下幾個因素：（1）由國家權力所推動；（2）服務於中央集權；（3）存在一種全國性的模式。在整個 20 世紀的中國，都是國家文化不斷取代著地方文化，這個速度在 1949 年共產黨取得政權後和 1978 年改革開放以後，得到了兩次加速。第一次是主要是由於政治的促進，第二次則依託於全球化和商業化的推動。

為了解地方文化的深層問題，我們把公共生活看作文化的一個主要推動力。公共生活總是在公眾的眼皮下進行，因此，政府、精英、媒體和社區都參與了塑造城市面貌和城市文化的活動。例如我在《茶館》的第二卷討論了對打麻將的爭論，這是在成都公共場所中最普遍的活動，它究竟是一種有益的娛樂，還是一種有害的生活方式？它是一種高質量生活的表現，或是反映了人們的無所事事？是集體利益至上，還是應該保護個人權利？……關於麻將的爭論，揭示了人們對社會巨變所滋生的各種問題的反應，他們是如何在傳統的生活方式與現代道德準則中尋求平衡，以及他們是如何評價大眾文化及其生活方式的。^⑤

大眾媒體，像它們晚清和民國時期的前輩一樣，總是試圖通過注入精英價值觀來改變大眾文化。^⑥媒體熱衷報道諸如打麻將這樣的大眾娛樂出現的問題，這反映出媒體對大眾文化和公共生活的懷疑態度。媒體總是試圖警告大眾，要避免沉迷於這樣的娛樂，防止造成嚴重的後果。我們可以看到，官方和大眾的喜好之間存在一條明顯的鴻溝，民眾玩麻將是樂此不疲，而官方媒體對麻將的報道卻多是消極的信息。其實，麻將的流行與人們在新的市場經濟中日益增長的物質追求、習俗中麻將作為社交工具以及對賭博的迷戀密切相關。

政府似乎主要關注官員和公務員在上班期間打麻將的問題，對普通人打麻將基本不加干涉。當局更關注地是，麻將是否會與腐敗有關，是否造成變相的行賄。與過去官方對麻將的嚴厲態度相比，儘管麻將經常與腐敗和賭博聯繫在一起，但是這時的政府並沒有進行任何反麻將的運動，只是對官員和公務員打麻將的時間、地點以及麻將的參與者進行了規定和限制。為什麼政府採取了這種寬鬆的政策？一部分原因可能是打麻將是一種娛樂活動，而且對官方來說，讓人們專注於發財——哪怕在理論上這種行為與正統的社會主義價值觀相矛盾，但是對其所希望的“社會穩定”卻是有利的。

當然，政府對打麻將的寬鬆態度，還有其他的原因：黨和國家在改革時代，仍然扮演著文化創造者的角色，雖然是以全新的方式。當 R 塞尼特（Richard Sennett）討論“新資本主義文化”時，便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新經濟真的能滋生新政治嗎？”在很大程度上，雖然執政黨並沒有改變，但是從經濟結構上看，中國越來越接近“資本主義”，財富分配的嚴重不均，致富手段的明顯不

平等，“更嚴重的後果可能是階級分化，有受益於新經濟的人群和那些沒有受益的人群”的巨大鴻溝。^⑭隨著商業文化的興起，國家運用了不同的策略，來保持其對日常生活與地方文化的影響力。正如王瑾所強調的，“國家現在變得越來越注重企業精神和形象塑造，但這也並不意味著國家放棄了對大眾文化的控制。”^⑮李瑞（Ralph Litzinger）表達了類似的觀點：“改革時代的黨和國家，絕沒有放棄其作為各種文化創造者的角色。”^⑯

新的政治文化也服務於國家對地方商業和地方消費文化的參與。如政府所預期的，更多的公民，特別是年輕人，將會專注於增加收入，這將使他們走向更好的生活而不是更關心政治。中國的政治文化有兩股潮流，一是有著鮮明的意識形態化，國家控制媒體、出版和教育等關鍵領域。然而，國家這種控制力現在受到了互聯網的嚴重挑戰。二是日益嚴重的貧富差距，造成新的不滿，這可能再次引發人們對政治的興趣。

現在一些學者引入了“地緣文化”（geo-culture）的概念，他們認為地緣文化可以解釋中國怎樣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的一部分。儘管中國實施著“高度集中的政治控制”，但中央政府給了幹部們對政策實施的“重要的解釋餘地”，中央政策下達到地方後，“可根據當地情況因地制宜”。^⑰其實，這樣的評價也可以適用於晚清時期。但在 20 世紀初，在現代化和西方化的浪潮之下，現代化的國家日益介入地方事務中。例如幾乎所有的城市改革，從城市管理到執法，從城市景觀到娛樂形式，都遵循西方的模式。^⑱但是即使是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大陸的文化產品，幾乎都是國家的產物”。在那個時期，“文化是單調且統一的”。^⑲因此，娛樂被意識形態所控制，被社會主義的政治文化——一種國家文化所塑造。國家文化並未給地方文化的生存與發展提供有效的空間。此外，我關於社會主義時期公共生活的研究發現，地方文化的持久力與地緣文化的存在，並非是因為國家給地方一個“重要的解釋餘地”，而是民眾對地方文化的堅持。雖然我們可以找到官員維護地方文化的事例，但是他們的出發點、思維、發展模式，本質上還是國家文化。許多城市發展和改造項目，表面上是為了保護地方文化，實際上卻在破壞地方文化。在現代中國，我們可以找到為了經濟發展而拆除老城區古建築、修建仿古街道和偽歷史建築的無數例子。

總之，1949 年以後的國家文化，是在“同一性”信條指導下，由社會主義國家所管理與推行的。它也是古代傳統的“大一統”思想，和毛澤東的宏偉目標——建設由意識形態、政黨和領袖三者領導下的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有機結合。從地方的角度看，這種中央集權推動的全國文化，基本上達到了對文化的集中控制。國家的統一文化對確立思想的統一和加強國家權力是有益的，但對地方文化的消極影響卻是不言而喻的。國家文化的霸權繼續弱化地方文化，在任何國家文化擴展的地方，便同時是地方文化萎縮之處。

改革開放後，國家一度退出對文化的直接干預，所以不少人回憶在八十年代所享有的自由是最多的，但在 1989 年後，國家對文化和娛樂活動的介入逐漸增加，並且在 20 世紀 90 年代後日益加深。在 90 年代中期以後，國家更多地干預文化活動，但政治意識形態介入與過去有很大的不同，這種介入既不是無產階級革命思想，也不是走向政治民主的新文化，而是在全球化時代，將中國文化傳統與現代生活方式、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結合起來，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在經濟上與西方緊密聯繫的同時，又在思想、文化和政治體制上與西方分割開來。這種國家的重新參與，不能被簡單地標籤為社會主義、後社會主義或保守主義，但其無疑是有助於服務執政黨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在這個程度上來說，國家並沒有簡單地從文化和公共生活中退出，它只是採取了不同的方式而已。

公共生活的現代性

隨著社會的現代化，人們日常生活的步伐也加快了。如 A. 海勒 (Agnes Heller) 所指出的，“任何生活節奏的變化，都必然會影響到日常生活，但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並不一樣，所以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被影響的程度也不一樣。”²³ 成都和 20 世紀中國其它的大城市相比，生活節奏要慢很多。但成都也像中國其它城市一樣，不可避免地經歷了快速發展的歷程。受中國政治、經濟、文化轉型以及全球化的影響，茶館、茶館文化、公共領域在形式上和程度上，都發生了極大的轉變。²⁴

到 2000 年，在成都的公共場所中，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娛樂休閒設施，諸如咖啡館、酒吧、網吧、卡拉 OK、私人俱樂部、舞廳、電影院、豪華酒店以及其它現代化的娛樂場所。此外，幾乎所有的家庭都有了一兩台彩色電視機，低廉的光碟播放器以及盜版光碟，可供人們觀看各種節目。同時，越來越多的家庭有了私人汽車，全家可以開車去郊遊，甚至遠途度假。難以置信的是，儘管成都人的休閒和娛樂有了非常多的選擇，但茶館業非但沒有因為它們的競爭而衰落，相反，發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幾乎遍佈城市的每一個角落。沒有人能預見到這樣一種強勁的發展。我們還沒有看到任何另外一種傳統的公共空間，在整個 20 世紀遭遇了如此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風風雨雨，仍然保持著如此旺盛的生命力。

我在《茶館》的第一卷中指出過，由於自然地理環境的影響，成都茶館的數量，至少從晚清開始，便較其它城市為多。不同於中國的大部分地區，成都的農村人口特別是成都平原地區的人們，不是居住在聚集的村莊裡，而是散居在靠近耕作的農田上。由於分散的居住模式，与其它地區的農民相比，他們更加依靠農村基層市場。農民在集市交易後，一般喜歡到茶館裡會友、聊天、休閒和社交，有些農民甚至直接在茶館進行買賣。²⁵ 此外，在成都平原上，狹窄的小路很難使用牛車馬車等運輸工具，人們只能用扁擔、手推車等人力工具來運貨物。因此，體力勞動者們把茶館作為解渴、休息之地。同時，成都較差的水質和有限的燃料，使得人們的日常生活更加依賴著茶館。市民的飲水依靠運水工把水從城外的河裡運進城內，而這對很多一般家庭來說是增加了花費，人們在家裡飲茶燒水非常不方便，而且成本也高，所以人們寧願直接從茶館中買開水，這無疑促進了茶館的生意。

然而，到 20 世紀末，成都的飲水、燃料和運輸工具，皆不成其為問題了，在家中飲茶也十分方便，但是為什麼人們仍然要光顧茶館呢？其中有許多因素，但最重要的一點是，茶館能根據時代的變化，不斷地調整自身的經營方式，以適應社會、經濟和文化的變化。特別是茶館能採納新物質文化，滿足新的娛樂需求。在 20 世紀初，茶館最早使用留聲機和放映電影，開創了新的娛樂方式。²⁶ 到了 20 世紀 80 年代，隨著影碟的興起，許多茶館引進了影像放映設施。隨後為了跟上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步伐，茶館安裝了空調，設置了私人包間。在“全民皆麻”的時代，茶館為打麻將提供了最方便的場所。茶館過去消失的服務現在都以不同的形式回歸了。例如，熱臉帕服務消失了，但卻出現了足浴服務。此外，茶館仍然有能力，維持大多數過去提供的服務，算命先生、挖耳師傅、理髮師、擦鞋匠乃至小商小販，在那裡仍然十分活躍。在茶館中，人們有時恍惚回到了過去，或是在現代與過去之間穿行往返。²⁷

西方傳進來的咖啡館和酒吧雖然在青年人那裡得到青睞，但也沒有能取代茶館，或是搶走茶館的顧客。喝茶對於那些經濟能力有限的人來說，特別是老年人，是再適合不過了，所以茶館主要的顧客是中老年人，但是一些中高檔的茶館所營造的環境和氣氛，卻仍然能夠吸引中青

年人。²⁹當代中國城市的咖啡館和酒吧基本上是西式的，幾乎沒有中國傳統的因素，但茶館卻是植根於中國的土壤。在咖啡館或是酒吧中，沒有小販、算命先生、挖耳師或擦鞋匠等，因此與現代化的咖啡館和酒吧相比，茶館包含了更多的當地社會、經濟與文化的因素。而且，在茶館中顧客只要花很少的錢，便可以呆上幾個小時甚至是一整天，加水而不必重新買一杯茶。在低檔的街角茶館，哪怕是陌生人之間也可以閒聊，這為普通人享受公共生活提供了理想的空間。

此外，我關於社會主義時期的茶館研究，還展示了傳統茶館和茶館文化是怎樣被商業革命和城市革命所影響的。流動人口為城市注入了活力並給茶館帶來了新的顧客群體。另外，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們有更多的時間去進行休閒追求，包括在茶館裡打發時間。在過去，人們局限在單位中，隨著後毛澤東時代公共生活的回歸，城市社會又重新引入了茶館這個最基本且越來越重要的社會單位。但是現代化也使得人們的日常生活節奏越來越快，在現代城市中，茶館將會再次尋找一條生存和發展的途徑，繼續成為公共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 21 世紀的城市改造中，成都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大拆大建，街角茶館所賴以生存的老街道和舊社區日趨消失，城市面貌煥然一新，隨之而來的是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爆炸式的城市發展，新商業文化的興起。我們可以發現，成都的命運和中國其它的古城相似，在過去中國的每個城市都有著自己獨特的魅力、面貌和文化，而現在這些獨特性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中國的城市無論在外貌和內在文化上，越來越趨於同一。因此，對社會學家、文化學家和城市史學家來說，恢復和保存中國的城市遺產，是一項迫切而重大的使命。像茶館這樣的倖存的傳統公共空間是否能繼續適應激烈的社會轉型的挑戰，以及面對新的物質文化的發展，其又是否能適應全球化、商業化的需要，繼續在現代的城市生活中發揮重要的功用，只有時間才能告訴我們答案了。

① Wen-hsin Yeh, "Corporate Space, Communal Time: Everyday Life in Shanghai's Bank of China",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0, no. 1 (1995), pp. 97-122.

②關於這個工作坊的討論記錄，請見裴宜理、李里峰等：《再思1949年分水嶺：政治學與歷史學的對話》，南京：《學海》，2015年第1期。

③⑬⑰Di Wang, *The Teahouse under Socialism: The Decline and Renewal of Public Life in Chengdu, 1950-2000*,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④Jeremy Brown and Paul Pickowicz,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 Introduction", in Jeremy Brown and Paul Pickowicz eds.,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18.

⑤John Gardner, "The Wu-fan Campaign in Shanghai: A Study in the Consolidation of Urban Control", Doak A. Barnett and Roy Hofheinz jr. eds.,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9, p. 539.

⑥Marlene R. Wittman, "Shanghai in Transition? Implications of the Capitalist Intrusion", *Issues and Studies*, vol. 19, no. 6 (1983), pp. 66-79; Dorothy J. Solinger, "Capitalist Measur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oblems of Communism*, no. 1 (1989), pp. 19-33; Lance LP. Gore, "Dream on: Communists of the Dengist Brand in Capitalistic China", in John Wong and Yongnian Zheng eds., *The Nanxun Legacy and China's Development in the Post-Deng Era*,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and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pp. 197-219; An Chen, "Capitalist Development, Entrepreneurial Clas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no. 3 (2002), pp. 401-422; Christopher A. McNally, "Sichuan: Driving Capitalist Development Westward", *China Quarterly*, no. 178 (2004), pp. 426-447; Li Zhang, *Strangers in the City: Reconfigurations of Space, Power, and Social Networks within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 Nina Ban-

- delj and Dorothy J. Solinger eds., *Socialism Vanquished, Socialism Challenged: Eastern Europe and China, 1989-200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 ⑦James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⑧這種認知的經典詮釋便是著名話劇《霓虹燈下的哨兵》，該劇展示了進入上海的解放軍士兵怎樣面對城市“資產階級”及其生活方式的挑戰。
- ⑨Jeremy Brown, *City versus Countryside in Mao's China: Negotiating the Divid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chap. 6.
- ⑩Di Wang, *The Teahouse under Socialism: The Decline and Renewal of Public Life in Chengdu, 1950-2000*, chap. 2.
- ⑪關於1949年以後的婦女解放，見Phyllis Andors, *The Unfinished Liberation of Chinese Women, 1949-1980*,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Yingying Chien, “Revisioning ‘New Women’: Feminist Readings of Representative Modern Chinese Fiction”,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no. 1 (1994), pp. 33-45; Janice Yee, “Women's Changing Roles in the Chinese Economy”, *Journal of Economics*, no. 2 (2001), pp.55-67; Harriet Evans, “The Language of Liberation: Gender and *Jiefang* in Early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iscourse”, in Jeffrey Wasserstrom ed., *Twentieth-century China: New Approach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p. 193-220; Jian Zang, “The Soviet Impact on ‘Gender Equality’ in China in the 1950s”, in Thomas P. Bernstein and Huayu Li eds., *China Learns from the Soviet Union, 1949-Present*,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1, pp. 259-274; Xueping Zhong, “Women Can Hold up Half the Sky”, in Ban Wang ed., *Words and Their Stories: Essays on the Languag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eiden: Brill, 2010, pp. 227-247.
- ⑫Li Zhang, *Strangers in the City: Reconfigurations of Space, Power, and Social Networks within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p. 11.
- ⑬Jing Wang, “Culture as Leisure and Culture as Capital”, in Jing Wang, *Chinese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State: A Special Issue of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no. 9 (2001), p. 71. 也可參見Jing Wang, “The State Question in Chinese Popular Cultural Studie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no. 2 (2001), pp. 35-52.
- ⑭關於民國時期上海對休閒活動的控制，見Frederic Wakeman, “Licensing Leisure: The Chinese Nationalists' Attempt to Regulate Shanghai, 1927-49”,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no. 1 (1995), pp. 19-42.
- ⑮Di Wang, *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 Public Space, Urban Commoners, and Local Politics, 1870-193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chaps.1 and 4; Prasenjit Duara, “Superscribing Symbols: The Myth of Guandi, Chinese God of War”,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no. 4 (1988), pp. 778-795; Prasenjit Duara, “Knowledge and Power in the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he Campaigns against Popular Relig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no. 1 (1991), pp. 67-83.
- ⑯Richard Sennett, *The Culture of the New Capital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31.
- ⑰Jing Wang, “The State Question in Chinese Popular Cultural Studie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no. 1 (2001), pp. 35-52.
- ⑱Ralph Litzinger, “Government from Below: The State, the Popular, and the Illusion of Autonomy”,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no. 1 (2001), p. 264也講到了國家與商業文化之間的密切聯繫。
- ⑲Jing Wang, “Introduction: The Politics and Production of Scales in China: How Does Geography Matter to Studies of Local, Popular Culture?” in Jing Wang ed., *Locating China: Space, Place, and Popular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 10.
- ⑳Joseph W. Esherick, *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 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1900-195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Kristin Stapleton, *Civilizing Chengdu: Chinese Urban Reform, 1875-193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0; Di Wang, *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 Public Space, Urban Commoners, and Local Politics, 1870-1930*, chaps. 4 and 5.
- ㉑Michel Hockx and Julia Strauss, “Introduction”, *China Quarterly*, no. 183 (2005), p. 525.
- ㉒Agnes Heller, *Everyday Lif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4, p. 244.
- ㉓已經有不少關於全球化對本地市場和文化影響的研究，見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and M. A.: Blackwell, 1990); John Bird et al, *Mapping the Futures: Local Cultures, Global Change; Massey, Space, Place, and Gen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Doreen Massey,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Place", in Doreen Massey and Pat Jess eds., *A Place in the World? Places, Cultures and Globalization*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45-86; Dolores Hayden, *The Power of Place: Urban Landscapes and Public History* (Boston: MIT Press, 1995); Kevin Cox, *Spaces of Globalization: Reassuring the Power of the Local*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1997); Don Mitchell, *Cultural Geograph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2000); Leo Ching, "Globalizing the Regional, Regionalizing the Global: Mass Culture and Asianism in the Age of Late Capitalism", *Public Culture*, no. 1 (2000), pp. 237-257. 關於中國區域和地域文化的研究，見William G. Skinner, "Mobility Strategies in late-Imperial China: A Regional Systems Analysis", in Carol A. Smith ed., *Regional Analysis*, vol. I: *Economic System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6), pp. 327-364; William G. Skinner, "Cities and the Hierarchy of Local Systems", in William G.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275-351; Stevan Harrell,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Jean C. Oi, "The Role of the Local State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China Quarterly*, no. 144 (1995), pp. 1132-1149; Carolyn Cartier, "Urban Formation in the Reform Era Chinese City: Landscapes from Shenzhen", *Urban*

Studies, no. 9 (2002), pp.1513-1532; Davis S. G. Goodman and Gerald Segal, *China Deconstructs: Politics, Trade and Regionalism* (Hove, U. K.: Kingdom Psychology Press, 1994)。

⑳關於這個區域的地方市場，見William G.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no. 1 (1964-65), pp. 3-43; no. 2, pp. 195-228; no. 3, pp. 363-399; 王笛：《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游區域社會研究，1644-1911》（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1、2章；Di Wang, *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 Public Space, Urban Commoners, and Local Politics, 1870-1930*, pp. 4-6.

㉑Di Wang, *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 Public Space, Urban Commoners, and Local Politics, 1870-1930*, pp. 119-120; Di Wang, *The Teahouse: Small Business, Everyday Culture, and Public Politics in Chengdu, 1900-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25, 155-157, 165-166, 175, 212.

㉒包亞明、王宏圖、朱生堅在他們的《上海酒吧》（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生動地描寫了上海的酒吧和酒吧生活。詩人翟永明也寫過一本關於現代成都的酒吧與酒吧文化的書（見翟永明：《白夜譚》，廣州：花城出版社，2009年）。

作者簡介：王笛，澳門大學歷史系主任、特聘教授。

[責任編輯 陳志雄]